

杨德广 著

高等教育专论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高等教育专论

杨德广 著

51.4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高等教育专论

杨 德 广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(邮政编码: 200031)

各地 **新华书店**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4 字数 308,000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151—3170 本

ISBN 7 - 5320 - 5472 - 1/G·5714 定价:(软精)15.80 元

序

这本《高等教育专论》，是在许多朋友和同仁们的促进和帮助下出版的。

长期来，除“文革”期间外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高等教育岗位。先后在华东师大、原上海市高教局、上海高教研究所、上海大学、新上海大学和上海师大工作。“工作、学习、研究”，是我生活中的三个最主要的内容。我的习惯，或者说是我的生活信条是：干什么工作就努力去干好，要干好就必须围绕这一工作而努力学习，对工作、学习的结果进行研究，上升到理论，努力探索新问题，然后把研究的成果再指导工作和学习。这就形成了“努力工作——努力学习——努力研究——努力工作”的良性循环，养成了科研的习惯。科研成为我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。

我在上海高教研究所担任过4年所长，其余时间都在教育管理、高校管理第一线工作。大量的行政工作、事务工作，纷繁复杂，千头万绪，许多矛盾、困难、新情况、新问题蜂拥而来，应接不暇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和进展，得益于学习和研究。繁忙的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我的学习和研究，相反，促进了我必须学习和研究，促进了我更有效地学习和研究。我学习的动力和内容，研究的动力和课题，主要来自于工作实践，也是为工作实践服务的。对我说来，不学习、不研究，就无法工作，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。

18年来，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，尤其是节假日，都用于学习和研究，共出版了20多本著作，发表了250多篇文章，大多数是关于

高等教育理论、高等教育管理、大学德育等方面的内容。我多次被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、四川、湖北、东北、海南等地的高校邀请去讲学,并受到热情的接待和鼓励,许多人都向我索要讲稿。去年暑期,浙江高师培训中心邀我为博士课程班主讲《高等教育专论》,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,学员们要求我印发讲稿。实际上,主讲的内容大多数是从我已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,于是我萌发了出版《高等教育专论》和《大学生教育与管理》两本书的打算。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,《高等教育专论》终于出版了。我要感谢教育界的朋友和同事,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在我发表的 250 多篇文章以及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教育观点中,有不少在当时是有争议的,正如有些人评论我“总是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、超前的观点”。这正是我的文章的一个特点。

我认为,发表文章总得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,因为教育是一种滞后的社会现象,所以教育研究应有超前性。80 年代初、中期,当我提出高等学校要招收费生,要鼓励发展民办学校,大学毕业生要进入人才市场,要改革大学生德育和管理时,就有人不赞成;80 年代末,当我提出高等教育要适应商品经济发展,跟上经济改革步伐,应实行政校分开,使高校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,对教育本质属性、学校职能、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出路等提出不同看法时,也有人不赞成;90 年代初,我提出教育领域要防止“左”的思想抬头,高等学校要走进市场才能走出困境,要建立教育市场,要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时,又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反对。值得欣慰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许多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“认同”。当然,我的观点中偏颇之处确有存在,为了尊重历史,这本集子出版之时,我基本上未对原文章进行大的修改。

我的文章的另一特点,就是立足现实,注重调查研究。有人曾经说过:“要了解我国高教的动态和现状应看看杨德广的文章”,这话过奖了。这无非是说我对每一时期高等教育中重大理论问题和

改革发展问题,都参加了讨论,发表了文章或看法。在我撰写的300万字的论文、著作中,绝大部分是反映现状的。我在原上海市高教局和高教研究所工作时,每年都要到一些高校和用人部门去学习、考察、调查研究。由于工作之便,我访问过10多所外国的大学,100多所国内的大学以及上海市所有的大学。我主管或分管过科研、教学、学生、研究所、人事、计划、财务、后勤、办公室、外事等方面的工作,这些经历对我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,也促使我主要从事应用性研究,兼顾理论研究。我是学理科的,缺乏文科的功底,更缺乏教育科学理论的功底,从事高教研究,主要是从工作实际出发,为了更好地工作。在我的文章中有不少调查数据,也全部放在本书中,以便对当时的情况有定量的了解,但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
为了让广大同仁和读者了解我18年来的科研情况,对各个时期高等教育的看法,特将主要的研究成果、著作及发表的文章附录于后,欢迎共同探讨,更欢迎批评指正。

在我从事高教研究的过程中,得到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教授的帮助和支持,得到原上海市高教局、高教研究所、上海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的领导、教师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,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目 录

高等教育与人才开发·····	(1)
从新技术革命看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·····	(37)
端正教育思想,深入进行教学改革·····	(47)
加强学生智能培养的几个环节·····	(58)
教育思想讨论中十个观念的思考·····	(67)
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探讨·····	(81)
改变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不相适应的状况·····	(91)
对十年来高教理论中若干问题的探讨·····	(98)
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回顾及展望·····	(119)
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及出路·····	(134)
世界教育兴邦与教育改革透视·····	(147)
高校教师队伍的现状及对策研究·····	(170)
招收自费生是深化高教改革的重要措施·····	(187)
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	(198)
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·····	(202)
我国应积极稳妥地发展民办大学·····	(222)
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的转轨变型·····	(229)
高等学校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·····	(239)
采取切实措施,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·····	(254)
努力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·····	(260)
当前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及对策探讨·····	(263)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 ——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·····	(270)

高等学校要走进市场才能走出困境	(292)
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和展望	(303)
教学改革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	(310)
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	(322)
关于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学的探讨	(334)
变革体制 转换机制 优化配置	(353)
加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	(362)
附录:杨德广主要科研成果(1979—1996 年)	(377)

高等教育与人才开发

现代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在他的名著《科学管理原理》一书的导言中指出：“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森林在消失，水力资源在白白浪费，肥田沃土不断地被洪水冲入大海，总之，人们能够看到和感觉到物质东西的浪费，但是人们活动中的笨拙的、低效率的，以及决策、指挥失误的行动更严重的浪费——罗斯福总统称之为‘国民效率缺乏’的现象，却不容易看到。”这是本世纪初泰勒所批评的在管理中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。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、很尖锐，切中时弊，是管理中的通病，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在我国，目前有一部分单位、一部分同志重视物质资源，轻视人力资源；重视物质投资，轻视智力投资；重视物资开发，轻视人才开发，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，重物不重人的一种表现。

党的十二大提出，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、现代农业、现代国防、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文明、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到本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，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8,000亿元。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。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提出了十年准备、十年振兴的战略部署。实现四化主要靠什么？十年准备主要应准备什么？答案是：靠人才开发，要准备大批又红又专的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人才。人才开发包括人才的培养、选拔、使用，而最主要的是人才培养。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办教育，必须进行智力投资。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人才开发的强大动力，智力投资是人才开发的物质基础，办好高等教育是人才开发的根本途径。下面就分

三个问题来谈。

一、社会主义“四化”建设是人才开发的强大动力

人才开发工作总是与发展经济、振兴经济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经验。战后 30 多年来,日本的经济建设、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惊人的发展,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如军事开支很少,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发了两笔大财,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等,这些是不可忽略的,是不足取的。但是他们在其它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。那就是他们重视教育事业,重视人才开发。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说过:“我国是资源小国,经历诸多考验,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,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”,“人才是我国的财富,教育是国政的根本。”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对于是否要首先发展教育事业,刚开始在日本是有争论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,日本以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,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创伤、深重灾难,到处是疾病、饥饿,毁坏的房屋、工厂。怎么办?怎样来恢复和建设国家,教育家们提出首先要恢复和重建自己的教育,让孩子们读书学习。他们认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,是振兴民族的根本保证。但这种主张遭到不少人的反对,他们认为连肚子都吃不饱,还谈什么教育,大人、孩子都应该下田种地,到工厂生产,恢复教育是 10 年以后的事情。当时这两种观点争论激烈。有见识的教育家坚持:不考虑立即着手恢复教育是不行的,因为若干年后,国家没有懂文化的科学人才,就无法恢复经济建设。培养人才是一个周期很长的过程,没有 20 年的时间则拿不出合格的人才,而缺乏这种预见又不及早做好准备,终归要吃亏。他们说,即使吃不饱肚子,也要勒紧裤带把教育事业办起来,政府没有资金,可由民间集资相助,先把小学恢复起来。教育家的呼吁得到许多热心人的响应,人们节衣缩食,筹集经费,在废墟上因陋就简地重建了学校。许多教师义

务上课,找出他们保存下来的课本和资料教起课来。当时日本在恢复教育上还有两个有利条件,一是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在教育方面逐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,尽管战争创伤严重,但战争前留下的科学力量储备发挥了很大作用。二是政府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投入到了恢复教育事业上来。

日本1950年的教育总经费为1,739亿日元,占国家收入的5.1%;1979年日本教育总经费为152,308亿日元,占国家收入的8.4%。日本十分重视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。战后日本教育政策的重点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提高全国青少年的文化素质,实际上是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,为高等学校培养大批后备力量。1979年的总教育经费中,幼儿园教育经费占3.7%,义务教育费占49.4%,高中占16.2%,高等教育占18.4%,专修学校占2.2%,社会教育占5.5%,教育行政费占4.6%,将近一半左右的教育经费用于普及小学、初中的义务教育。据1979年统计:在日本15—64岁的人口,具有初中毕业程度者占44.2%,高中毕业程度者占42.5%,高等教育毕业程度者占13.1%。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,向就业队伍输送后备军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。五十年代以初中毕业生为主,六十年代以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并重,七十年代以高中毕业生为主,八十年代以高中毕业生和具有二年以上大学程度的毕业生并重。

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也发展很快。1945年,日本战败时,旧制大学只有48所(除高等专科学校)。1949年进行学制改革,依照高等教育学制“单轨化”和“大众化”的精神,把许多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四年制的新制大学,并积极鼓励设置私立大学。1960年后,又大力发展二年制的短期大学。到1980年止,日本的本科大学由48所发展到446所,增长9.3倍;学生人数由战前的8万多人发展到183万人,增长了23倍;二年制短期大学517所,学生37万人。这两类大学共963所,学生220多万人,再加上高等专科学校

62 所,则超过 1000 所。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。从 1955 年到 1976 年,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高 5 倍,而劳动力仅增加 27%,其中技术所起的作用达 55—63%,这是跟日本重视教育和大量增加智力投资分不开的。日本在总结他们经济的巨大成就时,发表了《日本的成长和教育》的白皮书,明确指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“原因可以说是战前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这样一些人的因素,这正是过去几十年教育成果的积累。”其中特别指出,“应当充分认识到教育投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投资。”

德国和美国的现代化建设,也是从发展教育、开发人才入手的。德国的工业现代化比英国晚了半个世纪,它赶上英国,靠的是大办教育。德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普及了初等教育,他们的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也是欧洲搞得最好的。他们还创办了高等技术学院,其教育经费在当时欧洲各国中占第一位。学校不仅强调科学技术,也强调基础理论训练,因而当时德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居欧洲的首位。美国也是早就着重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各种人才的。历史上著名的“土地赠与大学法”和科学基金法案,大大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。美国现有 3000 多所大学,1000 万在校大学生。全国 18—24 岁的青年有 30% 以上在各类大学学习。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很重视发展教育,全国已普及了中等教育。全国高校 891 所,在校学生 530 万,到 1981 年底,前苏联居民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达 1.49 亿人,占全体在业人员的 85%。

国外发达国家搞现代化建设,振兴经济都是与发展教育、开发人才分不开的。今天我国要发展经济、振兴经济,搞现代化建设也应该靠发展教育,开发人才。但是,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的。有些同志认为应把自然资源开发,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,然后再考虑发展教育,培养人才。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人的智力在开发资源、发展基本建设中的作用。我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、矿藏需要

开发,但是它们要靠人,靠有科学技术的人去开发。由于我们的科学技术很落后,管理水平不高,在开发石油、矿藏时浪费惊人,经济效益很低。我国需要建设许多大型工厂、企业,建造铁路、桥梁、高速公路、高楼大厦,但如果没有大批有才华的专门人才、工程师、科学家,以及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队伍,则是望尘莫及、一事无成的。只有用现代科学知识把人武装起来,首先提高劳动力的素质,才能更好地开发物质资源,发展物质生产,提高劳动生产率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:“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”,“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,其中包括:工人平均熟练程度,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,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,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,以及自然条件。”这里精辟论述了教育科学、智力开发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

应该看到,现代化生产的发展,现代社会的发展,主要不是靠增加劳动力,因为劳动力在现代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他们从直接参加生产劳动,转化到主要负责控制生产,体力劳动减少,脑力劳动增加,生产劳动逐步变为科学劳动。有的同志可能要说,人在生产力中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吗?这句话是正确的,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。但在现代社会里所说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,而是指智化的人,即人的智力状况、对技术的掌握程度,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。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复杂的生产系统的组织和管理,对劳动力的智力程度即人的劳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了。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、脑力和知识技能三种能力。体力是一种生理上的能力,是良好的素质和体育锻炼的结果;人的脑力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能力,脑力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后天因素尤其是教育起决定性影响;人的知识技能更是来自教育的作用。因此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教育程度的提高。据有关资料介绍,罗马尼亚从 1950 年至 1970 年,国民收入的增长额有 64.4% 得益于教育事业;美国从 1948 年至

1961 年的国民收入增长额中,有 41% 是教育投资的收获;西德经济增长率的 50% 上下依赖了国家技术教育的普及;苏联每投入一个卢布的教育费用,能够取得四个卢布的国民收入。有人对苏联作过统计,劳动的效率与其受教育的多少成正比,具有完全中等教育的工程师所完成的生产指标,要比只受过 8 年制教育的工人高 25%;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工人所提的合理化建议,比没有受过完全中等教育的同样工龄的工人要多 4 倍。

我国以“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”而著称。以前总认为“人多好办事”,实际上这是一种只重人的数量,不重人的质量,忽视人的智力发展的表现。我国农村人口一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 80% 以上,现在是 10 亿人口,8 亿农民,劳动力很充足,为什么没有把农业搞上去?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用很少的人从事农业生产,粮食还大量出口。他们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 7.3 万多公斤,可以养活 59 人。差距在于人的智力程度,在于人的劳动能力,尤其是科学技术。近几年来,我国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,并不是靠劳动力的增加,而是靠党的政策威力,靠联产责任制,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第一个飞跃。但是,农业要进一步大发展,要实现第二个飞跃,则必须靠科学技术。现在农村有句新农谚:“责任到了户,家家都有队干部;责任到了田,人人争当技术员”。这就是说农民人人要搞科学管理工作,要掌握科学技术。当前,农村普遍存在四多一缺:粮食多、资金多、劳力多、时间多,缺科技。农民迫切需要学习新的科学技术,迫切需要高等学校、研究机构把文化、科学、技术送到乡下。从上海郊区来说,目前,有 76 万务工农民,年产值 34.8 亿,加上县办工厂,年产值 54 亿元,差不多等于解放初上海的工业产值。他们迫切需要专门人才,需要提高劳动力的智力素质,以便把生产进一步发展下去。再从农业生产看,1982 年市郊粮食亩产 764 公斤,棉花亩产 50 公斤,油菜籽亩产 156 公斤,蔬菜亩产 100 担左右。但上海农村土地少,抗灾力不强,

要实现高产稳产,难度很大,只有靠科学技术,否则不可能把亩产提高到 900 公斤以上。水稻、蔬菜、棉花的病害、虫害的防治,农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等等,这些都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去研究、去解决,而不是靠增加劳动力。所以人才开发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,不仅需要大批中等农业技术人才,而且需要大批高等农业技术人才。我国农村科技人员很少,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。

地区	每万名农村人口中的科技人员
美国	21 人
日本	9 人
苏联	7 人
中国	3.8 人
上海	4.25 人

上海的农业生产要搞上去,在 1990 年前,需要农林类专业人才为 3875 人,而上海农学院只能培养 1488 人,仅满足需要量的 38.4%,缺额很大。

上海的工业生产在全国居领先地位,但是随着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剧烈,上海原有的优势也在逐步丧失,尤其在国际市场上,我们的竞争能力还不强。党中央要求上海应在四化建设中多作贡献,当开路先锋,这是党中央对上海寄予的厚望,要达到这一目标,必须认识到上海在智力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,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一面,并努力加以解决。

1981 年以来,市高教局组织了部分高校,与有关部门一起作了一些人才预测工作,发现要发展上海经济主要不是缺劳动力而是缺科学技术人才。

上海食品工业拥有企业 600 多个,职工 10 万多人,全市食品总产值约 34 亿,占全市总产值的 5.5%。上海食品工业历史悠久,基础较好,产品的种类比较齐全,在国内外市场都很有影响。但科

技术力量很薄弱,直接影响了食品工业的发展。目前全市食品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技术人员所占比例平均为 1%。糖食饮料行业技术人员比例仅 0.6%,生产水平相当于国外 50—60 年代初的水平(硬糖生产还停留在国外 30 年代的水平)。由于我国没有一所院校专门培养糖食饮料或烟草技术人才,现有的技术人员都是学罐头、发酵或机电、外语专业的大、中毕业生改行的,还有一些是解放前或解放初就从事这些工作的老技术人员,他们虽然经验丰富,有较高水平,但年龄已老化。近年来,有经验的老工人大批退休,新工人大量进厂,技术力量很薄弱,有些名牌产品如华山食品厂的花生牛轧糖,由于老工人退休,已无法保持原有生产能力。另一方面,社会上购买力增强,人民对吃的要求提高,而且对高、中级食品的需求量大。因此急需增加科技人员,提高劳动力的智力水平和劳动能力。如果糖食行业技术人员从现在的 0.8% 达到 5%, (国外是 20%)则需要增加 750 名专业人才,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食品专业今年才开始招生(30—40 人),15 年才能完成食糖行业所需人才。

上海纺织系统有职工 48 万 8 千人,1981 年总产值为 138.02 亿元,占上海工农业总产值的 20.45%,上交利润全年为 26.36 亿元,劳动生产率为 3.03 万元/年人。

上海的纺织品出口量逐年增加,但国际市场上竞争很激烈,要能打入世界市场,并站住脚,必须靠先进科学技术,靠花样更新,靠培养高级专门人才。但目前纺织系统科技人员仅有 15,237 人,占职工总数的 3.1%。从文化程度看,其中高中、初中以下的 3618 人,占科技人员的 30.3%。从年龄上看,46—60 岁以上的有 7486 人,占科技人员的 49%。工程师平均年龄为 51.5 岁,所以已不适应纺织工业的发展需要,仅 1983—1984 年,纺织局系统需要高等学校毕业生 6551 人。而华东纺织工学院,华纺分院及上海纺专仅能满足其一小部分。

上海港务局正式职工 5 万多人,中专以上人员仅占 3%,上港是世界上八大港之一,每天货物吞吐量超过八千万吨。今后港口自动化、现代化都需要大量科技人才。

其它部门同样如此,都缺乏专门人才。根据 1982 年上海市人才预测,“六五”期间上海需要大专毕业生 11 万余人,即平均每年 2 万人。1982 年和 1983 年各方面申请大专毕业生的人数已超过 4 万人,但“六五”期间每年大专毕业生只有 2 万多人,可供本市分配的只有 1 万多人,远远满足不了需要。

当前最缺的专业人才:一是工科通用专业人才,上海工业企业科技人员占职工的比重为 4.2%,其中大专程度的只占 2.2%。二是外贸、财经、医科、管理专业人才。三是机关、企业所缺少的秘书、政工人员和政法干部。四是适合中小企业、街道集体企业、社队企业和农村多种经营所需要的专业人员。

由此可见,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搞好人才开发工作。10 年准备,10 年振兴,首要任务是人才准备。为了及早为经济振兴提供人才,改变教育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状况,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应当略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,人才开发工作应走在国民经济建设前面。教育周期长,高等教育只有在 80 年代有一个较大的发展,才能为 90 年代的经济振兴提供必要的专业人才。如果这个准备不足,经济一旦起飞,就会因为人才不足而受到阻碍。所以我们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具有紧迫感,各行各业都要重视人才开发工作。

正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四化大业,为人才开发提出了最紧迫的任务,也为人才开发创造了最广阔的前途。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人才开发的强大动力。现在我们有党中央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,有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,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干四化的积极性,我们的人才开发工作、高等教育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,而且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。